

“防艾”乡村医生感动网络

一个人背着药箱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尹祖鸾有些形单影只。为了“防艾”,她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不解与酸楚,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广宋村的乡间小路上走就是六年。

这名身处中缅边境偏远乡村的“防艾”乡村医生的故事,近日在网络感动了无数网民。网友“识途大马”说:像这样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人才是中国人的主流,美丽的中国人。



尹祖鸾(右)在村卫生室内为一名患者检查病情
新华社记者 简以光 摄

“刚开始时,他们放狗咬我、抬着刀追我”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欠发达县,尹祖鸾所在的景罕镇广宋村,是一个以景颇族为主的半山村寨,由于靠近毒源地“金三角”,这个村防控毒品和艾滋病的任务很重。全村533户的2138人中,在册吸毒人员就有326人,目前有艾滋病感染者52人——在别人眼里,这是一组数字,但在尹祖鸾心里,却是一个个揪心的痛。

2005年,当地政府把广宋村列为艾滋病综合防治试点村,投资

15万元建起一个集艾滋病宣传教育、咨询和村卫生室于一体的综合防治点。从此,村医尹祖鸾的身上就多了一项沉甸甸的任务: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她不仅要给村民看病,还要长年累月负责艾滋病感染者的检测、问诊送药。

在艾滋病的防治中,动员片区人群做HIV抗体检测是第一步。2005年这项工作起步时,没人愿意抽血做HIV抗体检测,“刚开始时,他们放狗咬我、抬着刀追我,说他们没有这种病。”尹祖鸾回忆,“最难的一户,我跑了十八次,花了四个月才告知成功。”

也难怪,村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多是吸毒人员,感染上艾滋病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压根不敢相信旁人会帮自己。有些感染者甚至认为免费治疗是拿他们做试验,要把他们毒死。

尹祖鸾很委屈,丈夫和朋友也劝她不要干这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但从小就跟着当“赤脚医生”的父亲学医,尹祖鸾耳濡目染的都是治病救人,想到自己的工作关系到乡亲们的安危,她咬牙挺了下来。

每逢周二、四、六,是尹祖鸾固定出诊的日子。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跟随尹祖鸾前往艾滋病患者老何(化名)家送药。出发前,尹祖鸾对照着清单,认真整理药箱,安全套、抗病毒药,一一数好……为了替患者保密,每次她都要把药品拆封,换上别的容器装药。

48岁的老何1998年在缅甸感

染上了艾滋病,一开始尹祖鸾给他治疗时,老何十分抵触,直到发病他才相信了尹祖鸾的话。老何说:“我现在还记得得病的时候,烧都无法退,拿冰块夹在肋骨两边,打了两天两夜的针,烧才退下去。”

在尹祖鸾的悉心治疗下,老何的体重从最瘦时的52公斤增到了现在的56公斤。以前他每顿吃一碗饭,现在每顿吃三碗。

“我差点就感染上艾滋病”

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不仅复杂,而且很危险,特别是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我遇到过两次危险,差点就感染上艾滋病。”尹祖鸾跟“中国网事”记者讲述起那两段经历。

一次尹祖鸾给一个感染者打针,那人喝醉了不停地乱动,针头戳到了患者还戳到了尹祖鸾。尹祖鸾吓坏了,吃阻断病毒的药就吃了一个月。

还有一次,她骑摩托车去县里送患者的血样,不慎摔倒,血样瓶摔碎还割伤了她,那次她也吃了一个月的阻断药。“不过还好,我去检查都没事!”尹祖鸾笑着拍拍胸脯。

最远的感染者家距卫生室12公里,步行要4个小时。茂密的丛林、崎岖的小路,尹祖鸾走了一程又一程。与感染者拉家常、讲解艾滋病知识和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一起做饭吃……点点滴滴努力中,尹祖鸾负责区域已实现防艾知识宣传教育全覆盖。许多感染者说:“艾滋病到我这里就解决了,不会再传给别人。”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安全套已流行。

如今,尹祖鸾负责区域九成以上15岁到49岁的群众自愿检测HIV,常住感染者保持百分之百每月随访率。

尹祖鸾说:“我作为这个片区

的乡村医生,跟艾滋病感染者接触是最远的,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帮他们,拉回他们的信心,再把他们拉回正常社会。”

她参与成立了“艾滋病感染者爱心互助小组”及“儿童活动中心”。爱心互助小组从最初的17人发展到37人,活动覆盖景罕镇的感染者一百多人。每逢节假日,爱心小组都会聚会,大家一起做饭、一起联欢,许多健康人也来参加。

“儿童活动中心”是广宋村艾滋病致孤儿童的乐园,在好心人捐助下设施日益齐全,周末孩子们都会到这里画画、游戏、唱歌、学书法。每次尹祖鸾都会准备些小礼物给孩子们,每次大家都在跳完欢快的景颇舞蹈目瑙纵歌后依依不舍地告别。11岁的果果(化名)说,阿姨给我们鼓励和支持,我们很喜欢她。

“我还是要带着他们好好地走”

防控艾滋病,尹祖鸾有一串长长的“工作责任清单”:对辖区所有感染者定期进行随访管理;对阳性者定期筛查CD4,凡是符合入组治疗条件的就带他们到县医院做人组前的相关检查;对已经入组治疗的感染者每隔2到3天随访1次。

这些年来,在尹祖鸾负责随访管理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没有一个人漏服一次抗病毒药、漏打一次针。她的努力结出果实,自从广宋村综合防治点建立以来,村里没有出现一例新增艾滋病病例。

许多感染者与尹祖鸾成了好朋友。尹祖鸾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去年6月,她丈夫去山上拉石头摔伤了颈椎,一次性需要支付八万元治疗费。大家知道后,纷纷凑钱,有的人还把自家所有的存折都送来给她。

“当时太感动了,他们把家里一年的生活费全部拿来给我,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老公早就死了。”尹祖鸾热泪盈眶。

一位病人家属拉着尹祖鸾的手,对她说:“尹医生,你是我们家的天,你来,我们家就亮了。”尹祖鸾珍视患者和家属的这份信任。

2010年3月,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专程来到陇川为尹祖鸾颁发贝利·马丁奖。见到尹祖鸾,马丁·哥顿感叹: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努力。

面对各种荣誉,尹祖鸾很淡然。她也有条件去考公务员,也可去乡卫生院工作,但她没去。“我还是好好做我的乡村医生,患者们对我那么好,我还是要带着他们好好地走。”她淡淡地说。“他们既要面对疾病的痛苦,还要面对社会的歧视,还要担负起家庭的重任,都是家庭的主力,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感动了我。”

黄昏,尹祖鸾告别病人,背着药箱,踏上回家的路。她知道丈夫和父母已做好饭菜,女儿也放学回家,全家都在等她吃饭。

而此时,网络上对她的声声赞誉还在热传——

网友“没有重名”说:这就是执著,这就是责任,这就是爱,这就是奉献。比千言万语实在,比万语千言感人。

网友“贺炜”说:喧嚣的世间,总有人在默默坚守,并不醒目,却散发出光辉的力量。

网友“小Thomas杰”说:致敬!艾滋病是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taosheng”说:致敬,你没有写进历史,没有被歌功颂德,却居一隅而遍洒人性的温暖……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岳冉冉 杨牧源

民国足球压得日本队抬不起头

清末民国,远东运动会共举办10届,21年间中国队获得9次冠军1次亚军,被称为“铁军”。与日本队比赛,经常打出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十几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既生瑜,何生亮”……这不是做梦,这是历史上的中国足球。

经费难筹 球员卖艺

经过民族资本主义10余年的发展,民国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各地军阀,也比较重视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但真正投资足球的几乎没有,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

那时,中国足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艺。为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元。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他们转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60余天,只筹到5万元。为了节约经费,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



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队阵容

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

主教练与球队训练

当时的足球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担任教练之机出国游览。最后,凭借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的双重职务,既有财又有势,他如愿谋得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业。

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又没有训练经费,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那时候,唯一的训练方法就是打比赛,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锻炼了队伍。

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对足球

队的选拔工作非常重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为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经过3个月的选拔,1936年4月,中国足球队22人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李惠堂,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其出色。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1926年李惠堂率自己的

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纪录,洗雪了中国球队“东亚病夫”的耻辱。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加坡举行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足球赛。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为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获2003年第26届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选举的“球坛荣誉大奖”。

柏林奥运会虽败犹荣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除了中国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券,准备洗雪前耻,不料又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足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纪录,

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体育场出了一口恶气,足球也成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最大希望。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中国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奥运足球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首战便是英国队,不能不令人悬心。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鼻祖,英国队的实力无可争议,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队在亚洲声名远播,十届比赛九次冠军,以这样的成就出征奥运会自然让欧美强国不敢怠慢,所以这场比赛广受瞩目。

8月6日的柏林汤姆逊球场被成千上万的观众挤得满满,英国女皇特地给她的国脚们发来专电,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而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则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

一上场,英国队的两名队员就死死守住李惠堂,使得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挫,结果以零比零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中国队的防守得当,大概13分的时候,中国队突然改变了进攻战术,全力以赴发动进攻,结果后方空虚,反而给对方造成了一个突袭的机会,英国人首开一球,在41分钟左右的时候,英国队又第二次打开了中国的球门,最后因为体力不支,中国队被淘汰了。

尽管如此,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全场的球迷和英国当时各家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主要原因是体力不支。

据《中国新闻周刊》